

会少了。

我的不可见还构成了一个大问题，那就是男性调查者可能知道更多事情，或可以进入更多领域，但我不行。在我被允许参加的第一次内部会议上，ECU 的主任告诉职员说我可以到场是因为他们不会讨论任何敏感的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可以参加更多的会议；但我被排除在有关一起卷入国家官员的政治腐败案的会议之外。后来 ECU 的主任说这件案子的政治敏感度太高，所以即使它是一件公开的、正在进行的案件我也不能参加任何内部会议。我总在想，如果是一个男性调查者是否也会被排除在案件之外。在我的想象中，一个男性研究者可以被更好的接受为这个群体的一部分，他可以去检查官的公寓看他的电脑，还可以在工作后和男人们出去喝几杯。

当然，我可以花大量毫无建设性的时间去想象如果自己不是女性而是男性，一切会有多大不同。我并没有花过多的时间想这个问题，但关于这些问题的思索是很重要的，哪怕没有别的原因，只是想让自己更好的认识性别如何影响田野工作这个问题。

结论

最后，如果我能对即将对男性主导环境进行第一次长期田野研究的年轻的女性调查者说几句，我愿意为她们提供一些建议。

首先，我想提醒她们，要认真考虑自己的外表对与被访者的互动产生的影响。如果调查在一个专业环境中进行，一定要严格遵守这个环境中的职业女性的穿着特点。第二，在进入环境前，女性研究者一定要尽可能多的了解这个环境和其中的男性女性所处的位置。这些预先的了解会增加女性在这个环境中面对时常出现的困难和障碍时的敏感度。第三，当女性研究者遇到性别主义行为或性骚扰时，应该考虑敏感并有策略的向负责部门报告。如果可能最好在私下解决问题（显然，这种办法只有在研究者的人身安全不受明显的威胁时才可行），公开惩罚或批评主人可能只会引起他们的戒备心理，使问题更难和平解决。如果私下联系不合适或起不到预期的作用，可以找这个环境中已同研究者建立了亲善关系的其他成员，向他询问如何最佳的控制局面。

最后，女性研究者必须意识到，在这一领域中，性别主义和性骚扰的确会发生。田野调查开始时就应该作好假设这些情况会发生的准备。实现就有应对这些情况的想法，当事情发生时就可以轻松处理。

【译文选载】

设法让人信服自我呈现

——关于进入田野的一些个人反思

威廉·沙菲尔 (WILLIAM B. SHAFFIR)

葛婧译 于长江校

尽管存在着各种各样对田野实践进行系统化整理的努力 (Burgess, 1984A; Johnson, 1975; Schatzman&Strauss, 1973; Taylor&Bogdan, 1984)，但我依旧总是被我所从事的田野项目的唯



一性所困扰。同时，尽管每一次调查都对“进入环境”、“接触被访者”的方式提出特殊的挑战，都要求有各不相同的策略，但每一次也都表现出很大范围内的共同特征，特别是在我努力保证顺利“进入”田野方面，即（a）虽然我害怕和担心自己被拒绝，但实际上人们参与研究的合作态度比我预想的要好；（b）他们的合作态度更多的是基于对我个人态度的反应，而不是对研究工作的“科学价值”的评价，（c）调查总是要涉及不同程度的假象和掩饰。

本章考察了在三个调查研究中与进入田野相关的一些问题。第一个研究关注于虔诚派信徒（激进的正统犹太人），是1969年于蒙特利尔 Montreal 开始的，那时我已进入研究生阶段学习，并且这一研究兴趣一直伴随我到今天。第二个和第三个项目也是关于犹太人和犹太社区的社会学研究。在1979—1980年间，我在耶路撒冷的两个犹太学校（yeshivas）进行了田野调查，它们致力于把世俗的犹太人男子改造成犹太教奉行者。第三个研究也是在以色列做的，时间是1985—1986年，旨在考察极端正统犹太人（haredi）的叛教，以及他们在一种以前很少接触的文化中的如何协商互动进程。我首先探讨如何把每一个研究的人群安排于一个恰当的位置而我自己又如何参与其中，然后讨论我在调查的最早阶段中自我呈现方式，目的在简化进入过程、获得更多合作。我通过观察得出结论，成功的进入研究环境，保证研究工作所需的合作，主要的并不在于在研究中按照什么“科学”准则办事，而是在于研究者能不能平易近人、入乡随俗，尊重他或她的东道主的文化世界。

进入环境，开始最初的接触

在有关田野研究的教科书和文章中，我常常看到“协商性进入者”的建议和提示，这些建议并不是特别有帮助的。尽管有一些经验性的规律（Lofland&Lofland, 1984），但是，每个环境的独特性，加上研究者的个人处境，会决定调查中应该采用的特有的协商策略。

我已经把调查的所谓“进入”阶段当成这样一个过程，它包含了把我的研究意图渗透给被调查者的因素。然而，所有的研究者首先面对的任务是给被研究者的定位。当研究的人群被限定在独特的场景或被置于一种划定的界限内，就不会有什么问题，就像我的关于虔诚派信徒和最近的奉行者犹太人的研究案例。几乎不用花什么时间，就发现蒙特利尔 Montreal 虔诚派机构的地址；而且，我和城市中虔诚派信徒的邻里非常熟悉。给这些（移居外国后）回家园的以色列人 betshuvah（这些新奉行者犹太人）定位几乎不是什么问题，因为我购买的一本小册子上列出了所有耶路撒冷有关这类人的各种机构的姓名、地址和教育方式。相对照的，那些从激进正统圈子中的叛教者，则不能通过任何机构的地址来确定，一度寻找起来非常困难。

回溯个人以往几年的工作，我发现在这三个研究里进入社区的过程都表现出两个中心特征：首先，人们总是比我预期的更加乐于接受和参加调查；第二点是，尽管我已经意识到这点，但在研究之初我还是常常感到很为难、很焦虑，因为我在合作中总是对人做出最坏打算。我已经学会应付比较温和的焦虑和不确定感，并已经把它作为社区调查经历中的一个部分。

田野工作在揭示研究者在田野中的情感经历时具有高度选择性。像做其他行当的人一样，我们的描述常常偏离，甚至完全忽略，那些我们认定不适当的陈述。我与虔诚派信徒最早的接触充斥着可观的紧张和焦虑。自我怀疑、担心和不确定的感觉就是我对田野工作中第一个月最生动的回忆。我能够清楚的回想起，在我和他们的最初接触里，我的感觉完全不能自控。这很容易得被归结为一种区隔我们各自生活方式的巨大的鸿沟，实质上反映在所有相关的维度上，包括服饰、价值和理念。尽管这样的感觉最终消减、消失了，但它们还是直接影响了我在田野工作中最早的日子。我在其他的地方写过关于我最初进入虔诚派信徒社区开创性的尝试（Shaffie1985），下面



的节选就指出了最开始时我的焦虑：

在我第一次的调查……虔诚派信徒的这一地区显得有些荒芜。这块飞地位于一个狭窄的土路的尽头，有两个年久失修的建筑，作为 Satmarer 和 Klausenburger 的犹太会堂和 batei-midrashim（学习礼堂）……几个 Samrer 的少年在一个临近的桥上玩游戏，他们把石头扔进一条溪流中，有几个 Bakhurim（青少年犹太学生）站在犹太会堂的门廊上。当我走近时，这些年轻人不再玩了。他们发现了我戴的 skullcap（室内便帽），这表明我是个犹太人。我原本有意进入这个犹太教堂，但是我突然感到焦虑不安，竟径直走了过去，没有和任何人搭话，其间我不断叱责自己的怯懦。当我第二天早晨回来时，我能够听到唱赞美诗的声音。当走近犹太人会堂时，我看到一个屋里挤着四十几个十几岁的男孩子；他们全都留着下垂的短发，穿着黑色的长外套，黑色的裤子，白色的衬衫，以及黑色的帽子……这使我当即感到，如果我就穿着白色的牛仔裤和混色的运动衫站在他们中间，那该是多么不舒服。还有，我要是真在里面，我该做什么？和他们一起祈祷？可能吧。然而，要参与祈祷，就必须假装熟悉那些祈祷仪式的来龙去脉和礼仪。我决定还是在第二天再开始我的调查研究。

在我第三次去这个虔诚派信徒的聚居地时，我终于鼓起勇气进了犹太人会堂，但是什么也没有发生。开始，没有人意识到我的存在。最后，几个年轻人和 balebatim（已婚男子）冲我点点头示意，给我一个地方坐下。接着是每个人都盯着我看，尤其是那些年纪较小的孩子们，他们选择靠近我的位置，等着看我是否正确佩戴护符盒，是否正确背诵赞美诗。我感到焦虑，完全手足无措。

我常常有感于我用于会见虔敬派信徒并学着去感受放松所花的时间和精力之多，尽管我在他们之中从来没有完全放松。我毫不怀疑，我成功地与这些虔诚派信徒会面，开始密切熟识他们的世界和虔诚派社区的组织机构，这些都直接取决于我频繁地到他们家里和机构中访问他们，把自己委身于他们的团体。

和我在虔诚派信徒中的初次冒险尝试形成比较的是，我和新奉行者犹太人的第一次接触给我很大鼓励，使我相信研究的过程将会很顺利。毕竟，我已经熟悉了学员的文化和背景，也能够善意理解他们生命意义和目标的搜寻。如果说虔诚派信徒不太理解大学和学位之类的东西，那么这些“回归以色列人” betshuvah 则是很熟悉社会学和学术研究的。

由于我并不愿意象一个感兴趣的新来者一样来走马观花，而希望能够观察一个学员互动的全部过程，我决定把我的研究计划通告一个犹太学校校长。（我曾经在一个虔诚派信徒团体内部进行过一次隐秘的调查，发现这样的经历是有局限的，在道德上是令人反感的）。他耐心地听完了我的介绍回答：“尽量放松。来我们的班级吧。就在这儿吃，我还能给你找个地儿睡”。这些回答让我得意忘形，我马上找到了一个不同的但是相似的学校的校长，我处是我的证明，希望得到一个相似的接待。他的面部表情表现出的并不是真有兴趣或欢迎，回答也确证了这种疑虑：“如果你是来搞调查的”，他说，“那不要在这儿做了。我不想要它，我也不知道有谁需要它”。虽然有这样的回应，但还是有很多的学生对调查非常感兴趣，并鼓励我回来。像其他人一样，我已经发现了‘看门人’对调查的赞同并不能保证有关环境中他人会热心合作；而在一种等级制的安排中，部属也可以不理睬他们的上级（不愿接待）的意愿，可以在研究中热情地支持和协助。

那些相信他们有重要的故事的人通常非常急切地把他们的经历与愿意听的人分享。好像那些获得新生的宗教皈依者，很多新奉行者急切地劝戒别人改宗，把我看作一个潜在的新的皈依者。这种热情反映在他们急切的要和我会面，谈论他们的过去、神圣的天意 Providence 是如何介入



了他们的生活，以及他们未来的渴望。尽管我和人们会面相对来说比较轻松，但是每当我要求和某人谈话时，一般还是准备遭到拒绝。然而，我现在只能想起有一个人直接地拒绝了我的访问。我怀疑自己不完全受欢迎是由于这样一个基本的曲解：我把一个无关紧要的回应当成了具有否定意义的。我很希望人们会对我的研究好奇而且充满热情，同样，大多数人的兴趣本来也不会太少。实际上，我的调查并没有对他们造成太大的影响，因为他们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去处理。

事实证明，那些前虔诚派犹太人比我预期的要难以捉摸得多。我很快意识到没有制度性框架可以供我确定这些人哪里。这样我安排会见了一个新闻记者，她最近写了一篇相关主题的敏感报道，她宣称她在她的报纸上登广告约见前虔诚派人士，由此找到了被访者的地址。而我所刊登的同类广告，只招来了一个人，这个人宣称他不知道任何象他这样的人。尽管他并没有为我带来更多的接触，但我和他的对话还使我深切感受到了他离开超正统派世界所带来的痛苦，苦闷和绝望——这一主题被证明是我后来见到的每一位前虔诚派信徒的描述的中心。

在会见虔诚派信徒和新奉行者中很有效的滚雪球方法，却无助于超正统派的项目。我见到的原来的超正统派猜测有其他一些像他们那样的人存在，但是他们不知道如何去寻找。尽管开始我对这种说法持怀疑态度，但慢慢地我能够判断，在很大程度上，那些前超正统派人士和他们的以前的圈子已经被隔绝开了，因此他们几乎不知道那些最近的叛教者。一个重要的例外是 Chaim（一个假名），他的名字是我从一个前超正统派信徒那儿得到的，这是唯一由新闻记者提供的知情人。在我和他会谈的最后，我问他是否知道其他一些像他那样的人，我何以会面。“是的，我知道”，他回答“我有他们的名字和电话，你想采访多少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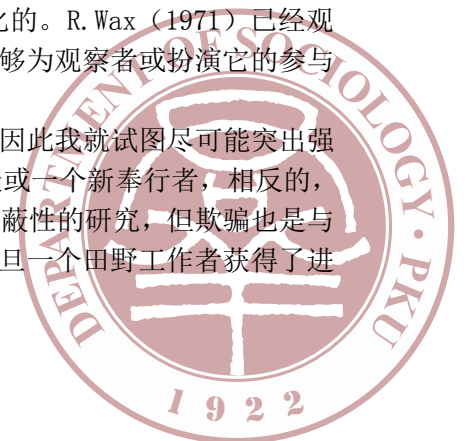
随着我和 Chaim 关系的进一步发展，我想到把他当作我的‘Doc’。这很像 Willian F Whyte 的（1943/1981）的知情人，他对于 Cornerville 具有密切的理解，而 Chaim 也具有一种天赋，可以分析超正统社会这个复杂圈子以及脱离圈子的相关问题。Chaim 会提供给我一些比姓名和电话等信息更多的东西；他通常会给我补充一些关于特定个人有趣的背景信息，告诉我这个个人的背景是如何在某一维度上增加了和加强了已存在的激动人心的故事进程。

不管调查如何，进入田野、建立关系的过程总会花费调查者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尽管我成功地获得了“进入”，但这一个过程对于我来说还伴随着一轮又一轮的焦虑。在我感到我终于获得某种程度的接纳之前，我发现我自己被调查搞得筋疲力尽，常常思索各种适当的策略，旨在获得更多的融洽和接纳。尽管这是极端令人头疼让人伤神的，但是“进入”的过程也是极具挑战性的，而且在深层次上取决于采用哪一种“自我呈现”的特定角色。

自我呈现的策略

从它的本质上来说，田野调查要求一些角色扮演和表演的手段。为了获准进入研究场景，保证他或她的东道主的合作，调查者要学会呈现她或他自我的特定形象。这个由调查者本人提供的形象不能是事先决定好的，而是在田野中遭遇的偶然性后的反应。而且，就像田野工作记录所证明了的，这种扮演的所谓角色几乎不可能是静态的，而是在不断演化的。R. Wax（1971）已经观察到，调查者最终发现，任何特定角色要想被评价为最好，它必须能够为观察者或扮演它的参与者提供一个最有效的地位。

由于我发现直接的掩饰不但道德上难以接受，而且还难以操作，因此我就试图尽可能突出强调我对我的研究的兴趣。我从来没有假装有兴趣成为一个虔诚派信徒或一个新奉行者，相反的，我把我自己首先界定为一个来做研究的社会学者。尽管承诺从事非隐蔽性的研究，但欺骗也是与生俱来地存在于参与观察。Gans（1968）曾经引人注目地写到：“一旦一个田野工作者获得了进



入，人们就会倾向于忘记他的存在，放下他们的警戒，可是研究者却没有这样；不管他是如何的看起来在‘参与’，他实际上是在那儿观察的，甚至观察当人们放下他们的警戒时会发生些什么。”

(P314)。我发现这样一种方式上的欺骗是不可避免的，尤其是在我的研究的早期：与我计划要研究的这些人完全分享我的研究兴趣、想法以及计划，是不明智的，也是不可操作的。

自我呈现和调查不是在一个真空中被组织起来的，而是由场景中调查者与之互动的人们来形塑的。我最早接触的虔诚派信徒是 Lubavitch 教派，在犹太人中，这个教派以他们热心地劝戒他人改教而闻名。我估计如果他们确信我在研究中有个人考虑的话，他们的合作可能会加强，这种估计在我最初的一个谈话中得到证实。一个 Lubavitch 信徒问我“你究竟为什么对虔诚派信徒这么感兴趣？”我本能的认识到我的回答中如果包含个人动机的的好处，这也不是完全不真实，但就在我有机会勾勒我的观点之前，这个人解释道，“你知道，如果这只是为了你的学术研究，我会用一种方式来回答你；但是如果我知道你作为一个犹太人也对此很感兴趣的话，我将会用不同的方式回答你的问题。”

通过阐明我的个人的和学术的兴趣，我试图展示一种独特的形象，我猜想这样做会使我更受欢迎。事实上正是如此。我能想到很多方式使我可以按照对方的期望来修改我的行为，这样就可以增加我在虔诚派信徒中的接受度。例如，我戴了一顶黑色的 skullcap，就是超正统教徒戴的那种。早上拜访犹太学校时，我戴上护符盒，甚至我专程去纽约参加 Lubavitch 信徒的集会。尽管这些行动无可否认的包含了一种掩饰的因素，但我，实际上，作为一个犹太人也渐渐地被引向虔诚派信徒了。我不单单是那种工于心计的研究者，小心的计划如何最好地进行研究。我是这样，但还不止于此。我的自我呈现不时地在受有关个人的想法和目的的影响，不亚于受学术影响。

我发现有一个策略特别有用，那就是对自己的学术身份轻描淡写。这种方式实际上是我在对虔诚派信徒的研究中被迫接受的。我很早就清楚地发现，在我介绍自己时，绝大多数人对“大学”和“博士学位”这些东西连最朦胧的概念都没有。我很快发现，在我的词汇表中消除“社会学”这个术语是大有好处的——看起来它制造混乱多于澄清——，我只是简单的介绍我是一个当地学校的学生，按要求写一点东西，我选择了写虔诚派信徒。我相信这样的介绍几乎不会有什么麻烦。这使得这些虔诚派信徒们既不会非常乐于该研究，也不太可能对它作出反应。大多数人只是不能理解为什么会有人写关于他们的东西。

不管调查者宣示的目的是什么，一个群体的成员很快发展出他们自己对于一个陌生人突然出现的解释。这些 Lubavitcher 虔诚派信徒把我的出现解释成他们在更大的犹太社区中热心劝服人们改宗的成功的证明。Satmreer 虔诚派信徒是一个最极端的教派，他们把我的出现做了不同的解释。在我的最初拜访他们的犹太教会堂时，他们问我是否来这儿背诵犹太教的珈底什，这是为死去的人做的赞美诗(每日作礼拜时或为死者祈祷时唱的赞美诗)。毕竟，象我这样一个人，还会有什么别的理由在他们的会堂里背诵下午祈祷词呢？我与这些虔诚派信徒共处的最初几个月表明，研究者并不是简单地自己选择一种特殊身份，研究者会发现，他或她会被东道主赋予一种身份，它反映的是东道主们对于他或她的出现的理解。

尽管我向所有的 chozrim betshucah 和前超正统派人士介绍我自己是一个社会学者和研究者，我这样做只是走形式。尽管有时候我被问及研究的目的以及他们的名字是否会在任何出版物中提到，但关心这些的只是极少数人。我想，大多数人觉得奇怪，怎么会有人认为他们的经历值得首当其冲的调查。看起来，我个人的证明，比学术证明更有利于保证进入和获得合作的目的。(Dean, Eichhorn&Dean, 1969;R, Wax, 1971)

我认为自己是个害羞的人，我已经把这种品质当成一种优势应用到了田野研究中。我不渴望成为中心人物，时时卷入交谈，我学会了在接近人们聊天或访谈之前保持耐心。同时我努力做到



友好，有礼貌，有魅力的。我好像有一种敏感，知道什么时候最适于把人们引入交谈，什么时候让某人自己独处。更像是那些喜剧演员，在后台独处和默然，但在观众面前则尽情表演，一旦进入田野，我就能成功地掩饰我的焦虑和不确定感。我从事访谈时俨然是镇定，轻松和自信。事实上，我还试图努力保证我们的会谈总是以一种“邂逅”交谈的形式。尽管外表镇定自若，但实际上对我来说，访谈是一种高度紧张的经历，这种经历是一项极度消耗脑力的活动，在此之前我要好好的准备。我从来没有感到必须从一开始就集中在研究题目上，实际上我更愿意从一些更一般的题目入手，这样是我能够比较快地评估被调查者个人的特征和行为。

要想学会从事田野调查，包括非正式的访谈，不但要求技巧，还要求机敏的应变。每一个调查者采取了一种他或她本人感到舒服而且能带来效果的研究方式。我通常假装对一个题目知道的比实际上要少。尽管我可能对每一个问题都使用这样一套措辞：“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有意义”，但实际上我已经通过别人确认我的一系列问题是切中要害的。我通常能够感知到什么时候讨论变得太个人化而令人不安，能够把它导向一个不同的方向。我也能够巧妙的利用我的幽默感为紧张和担忧的情境带来一些轻松。就是在这点上，一些欺骗的手段成了研究过程的一种特征。

结论

尽管在开始进行一个新的田野研究项目时，我总要经历紧张和困扰，但这个时期也是充满了激动和挑战。正是在这个时期，可以遇到新的人，建立起各种关系，产生各种假设，所有这一切都使我的研究技能面对新的考验。这种实践的紧张感的最高点，通常在田野工作最初的几个星期或几个月份里，这时我要作一种拼图游戏，竭尽全力弄清那些令人迷惑的碎片，猜想如何按它们原本的样子把它们再拼到一起。

研究者常常要假装自己更完全的参与一个社区的活动，尽管实际上他是一个超然的观察者。他们通常要假装问一些天真的问题来收集一些数据资料，不这样就无法获得。我相信，田野工作中这些带有欺骗性的做法，是和日常生活一样于生俱来的。至于更违反道德的、更直接的欺骗，几乎没有必要。人们合作与否，主要并不取决于该研究的性质，而是取决于被调查者对田野研究者的感知，即研究者是一个正常的人，能够尊重他们，真诚地对他们感兴趣，善意地对待他们的，同时当与人们在一起时，他或她愿意遵从人们的行为的标准。简而言之，运用常识性的社交技巧（友善，幽默，分享）是从事田野研究的必备条件，这一点，和在其它那些与我们专业工作不相关的情景和环境中的处理事务没有什么不同。

【教学相长】

课后作业选编

课程名称：社区研究的理论与方法

作业题目：根据教师提供的3幅田野调查照片，探讨研究者与被研究者的关系。

答案1：

（答题者：朱庆华）

